

经济公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 ——全球化时代中的政治伦理学

[德] 奥特弗利德·赫费 著

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 译丛

上海译文出版社

经济公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

全球化时代中的政治伦理学

[德] 奥特弗利德·赫费 著

沈国琴 尤岚岚 励洁丹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公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全球化时代中的政治伦理学/（德）赫费著；沈国琴，尤岚岚，励洁丹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2

（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译丛）

ISBN 978-7-5327-4907-2

I. 经… II. ①赫…②沈…③尤…④励… III. 政治伦理学-研究 IV. B82-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73437号

Otfried Höffe

Wirtschaftsbürger, Staatsbürger, Weltbürger Politische Ethik im Zeitalter der Globalisierung

© Verlag C. H. Beck 2004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6-356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经济公民、国家公民和世界公民

——全球化时代中的政治伦理学

[德] 奥特弗利德·赫费 著

沈国琴 尤岚岚 励洁丹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2 字数 204,000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200册

ISBN 978-7-5327-4907-2/B·314

定价：33.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401196

总 序

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实践哲学的伟大传统继续存活于一种对其哲学内涵有所了解的解释学之中。

——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卡尔·马克思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动向，我们把它称作“实践理性转向”。所谓“实践理性转向”，主要是指西方主流哲学界在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元伦理学阶段和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阶段之后，恢复了对于价值的理性基础、规范的根源和辩护，以及伦理学与本体论的关系这些实践理性的传统主题的兴趣。无论是在研究的主题、范式、方法方面，还是在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方面，“实践理性转向”都可以说是继“语言学转向”之后西方哲学发展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这一转向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语言学转向”是相对于古代的“存在论转向”和近代的“认识论转向”而提出来的，它被公认为20世纪最有代表性的哲学

范式转变。只要我们观察一下“语言学转向”兴起之前的两次哲学转向,就会发现,一种哲学范式的真正确立最终依赖于自身规范基础的阐明和辩护。古代哲学的理念,即善的存在论学说,是其目的论伦理学的背景和前提,而这种目的论的伦理学则是古代存在论的规范内涵;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近代认识论是道德自主性学说的背景和前提,而这种道德自主性则是近代主体性哲学的规范内涵。按照这样的提问方式,我们很有理由追问,“语言学转向”的规范内涵是什么?相应地,所谓“实践理性转向”——如果这种“转向”名副其实的话——的哲学前提和基础又是什么?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遭遇了“语言学转向”与“实践理性转向”之间的关系这一贯穿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重大问题。

首先,“语言学转向”对 20 世纪前半叶的西方实践哲学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逻辑实证主义提出命题或陈述的三分法,把价值判断放逐到无意义的领域,而元伦理学则把自己的任务局限在对价值词汇用法的琐碎研究上,放弃了理性地探讨价值分歧和规范基础的重要使命。50 年代以后的“后实证主义”革命冲破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樊篱,对价值问题的探讨持更为宽容的态度,为实践哲学的复兴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是实践理性转折的前奏,但其物理主义倾向以及此后继语言哲学而起的心智哲学研究取向,又引发了在规范问题、价值属性和价值判断问题上的新一轮的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以及认知主义与非认知主义之争。直到 20 世纪末,“语言学转向”的规范内涵依然是一个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例如,在分析哲学的匹兹堡新黑格尔学派内部,是像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那样继续坚持“语言学转向”,承认拥有信念和意愿仅仅是玩一种运用这些词汇的语言游戏,因而哲学的职责只是阐明我们语言的和非语言的实践,而不是根据外在于这些实践的

规范判断这些实践；还是像约翰·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那样,在坚持不具有概念结构的东西无法证明信念的合理性的同时,也坚持非判断的心理事件能够证明信念的合理性,从而得出“除非知觉现象不同于判断,否则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康德意义上的自由”的结论,这已经成了一场震撼盎格鲁-撒克逊哲学界并且波及德语学圈的大争论。而在新法兰克福学派的语用学的“真理共识论”与美国实用主义和法国后现代主义相结合所产生的新实用主义倡导的“语境论”之间的辩论中,又出现了对于民主的规范含义的不同理解:对于真理共识论者来说,民主是基于普遍的交往理性的包容性共识;对于彻底的语境论者来说,民主只是受文化和地域限制的一种排他性的团结。诸如此类的重大分歧不免使人对“语言学转向”究竟要转向何处心存疑虑。

其次,尽管实践理性是西方哲学的固有传统,但当代的“实践理性转向”和“实践哲学复兴”又有它独特的背景和前提。实际上,从“语言学转向”到“实践理性转向”的演变昭示我们,这两种转向之间不但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且具有逻辑上的相关性。一方面,“语言学转向”是绵延整个 20 世纪,横跨英美与大陆两大传统(新法兰克福学派中有把实用主义独立出来,与分析传统和现象学传统鼎足而三者)的基本范式,就此而言,它不但构成了“实践理性转向”的背景,而且为后一种转向创造了条件,或者说为更好地阐明自身的规范内涵创造了条件,这尤其表现在滥觞于日常语言哲学并经与美国实用主义互释后产生的所谓“语用学转向”中。另一方面,作为“实践理性转向”之重要一环的道德心理学研究的勃兴则不但在智识氛围上呼应了心智哲学在 20 世纪晚期哲学中日渐上升的地位,而且从智识效能上对语言哲学和分析哲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于宣告分析哲学已

死,“语言学转向”这一范式也已经走到了尽头;更为重要的是,语言哲学中的(与语言含义相关的)内在论与外在论之争,心智哲学中的(与心智内容相关的)个体主义与反个体主义之争,以及实践哲学中的(与规范辩护相关的)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之争,这三者之间的纠结和紧张将引领人们重新审视分别由分析学派和现象学派在20世纪初以反对心理主义和自然主义之名发起的哲学革命的潜能是否已经消耗殆尽,而这不但关乎自古希腊以来即已奠基的作为理性守护者的哲学事业的命运,而且与人类对于自身以及我们置身其中的共同体的自我理解密不可分。

上海译文出版社历来重视当代西方哲学重要著作之译译,所创设之“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更是在学术界享有良好的声誉,深受读书界的喜爱。“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译丛踵武前贤之事业,尝试以更为主题化同时也更富时代感的方式系统地译介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的代表性成果。一方面旨在围绕关于遵守规则和私人语言、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争论,集中展示语言分析传统对于价值与规范的理性和形而上学基础的探讨,同时关注当代欧陆哲学中重视把分析传统与现象学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哲学家的著作;另一方面试图较为全面地呈现“实践哲学复兴”中道德哲学(包括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方面的优秀成果,同时关注当代欧陆哲学中对古典哲学的根本问题和现代性的根本内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性的探讨,还涉及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品。

我们期望并且相信,根据对于西方哲学发展趋势的上述理解和把握,按照问题性和前沿性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哲学同仁们艰苦、扎实、细致的工作,本译丛必定能够把中国哲学界和出版

界的西学译介工程真正推向深入,促进学术界对于 20 世纪西方哲学建设性成果的全面总结,并最终为当代中国的哲学事业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滋养。

本译丛得到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研究项目的支持。

庞学铨 应奇

2007 年 1 月于杭州

目 录

001 **1. 引言**

I. 经济公民

- 011 **2. 自我负责和自我实现：劳动**
- 011 2.1 劳动替代悠闲
- 014 2.2 道德评判
- 019 2.3 劳动的权力
- 021 2.4 公民报酬或公民义务？
- 024 **3. 利益及其他：关于企业家的道德**
- 024 3.1 作为企业家的哲学家
- 026 3.2 从个人利益到共同利益
- 031 3.3 认同
- 035 3.4 管理者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 042 3.5 大学政策：一项警告
- 046 **4. 社会公正：一个政治咒语**
- 046 4.1 两项特征
- 047 4.2 平等
- 051 4.3 相互关系

- 054 4.4 机会平等和前途平等
- 059 4.5 安全陷阱
- 063 **5. 展望：报酬公正？**
- 063 5.1 回顾历史
- 067 5.2 插入语：报酬上的嫉妒心理
- 069 5.3 字面上的报酬
- 071 5.4 基本美德

II. 国家公民

- 077 **6. 公民意识**
- 078 6.1 法律意识和公民精神
- 079 6.2 公正意识和判断力
- 081 6.3 公共意识
- 084 6.4 民主的完整性
- 086 **7. 公民参与的扩大**
- 086 7.1 公民社会,抑或平民社会
- 094 7.2 直接民主
- 100 **8. 宽容**
- 101 8.1 阶段和类型
- 103 8.2 多元化和宽容
- 105 8.3 关于历史和合理化
- 113 8.4 以头巾为例
- 119 **9. 荣誉,谁应得到荣誉**
- 119 9.1 启蒙后的概念
- 125 9.2 原始的公正

128	9.3 “以名誉作担保”
129	9.4 原始的可靠性：政治上的诚信
135	10. 民主的教育事业中的价值
136	10.1 基本价值
138	10.2 回顾世界史
143	10.3 自由民主的价值
147	10.4 民主的教育机构

III. 世界公民

153	11. 世界文化共存
153	11.1 四种世界公民
155	11.2 跨文化的法律讨论
160	11.3 两个历史典范
164	11.4 获得承认的法律原则
165	11.5 伦理加人类学
167	11.6 世界共和国：八条抗辩
178	12. 西方价值还是普遍价值
179	12.1 标准的现代化
181	12.2 案例
186	12.3 六条法律政治评论
190	12.4 土耳其已经属于欧洲了吗？
197	12.5 跨文化的公民素质
199	12.6 附加：私人性、身份和信息保护法
207	13. 共存于霸权下？
207	13.1 集体霸权：安理会

- 209 13.2 个体霸权：美国
- 216 13.3 霸权的公众社会
- 219 **14. 权宜之计：紧急救援**
- 220 14.1 六项条件
- 226 14.2 五点经验教训(科索沃)
- 227 14.3 先发制人的战争(伊拉克)?
- 234 **15. 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政策**
- 235 15.1 什么是发展?
- 238 15.2 对于援助政策正确性的辩护
- 243 15.3 贸易援助?
- 247 15.4 发展中国家的责任
- 251 **16. 自然的七种面貌**
- 251 16.1 “捉摸不定的关系”
- 256 16.2 利用、探察和统治
- 262 16.3 美丽和宁静
- 265 16.4 展望：林业经济

IV. 公民及更多

- 271 **17. 如：人文科学**
- 271 17.1 五种能力
- 275 17.2 跨文化学习
- 285 17.3 市场能力及自由
- 291 **参考文献**

1. 引 言

当今的众多变化,其机遇及困难均与全球化这一词语紧密相关。然而具有洞察力的目光并未把全球化仅限于经济及金融市场,而是察觉到其三个要点——日趋去边境的进程、其策略及由此而产生的状况,即愈益增大的全球性——是在三个范围中进行的:在一种全球性的权力共同体中;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全球性的合作体中及在一个具有风险、困难及痛苦的共同体中,因为有组织的违法行为、恐怖行为、环境与气候问题以及难民潮和移民潮早已冲破了国界,乃至洲界。

在所有这三个层面中均存在着一种全球性的行动需求,该需求需要一些深谙全球性的活动家。在我的一篇题为《全球化时代的民主》论文中首先探讨了相关机构、组织及它的框架,即一种全球的法制。倘若要使这种有用的共同生活首先在这种集体内,然后在集体间获得成功,需有具有责任性的主体,即公民以及由公民支撑的公共社会,即公民社会或国民社会,在上述论文中,我只是粗略地提及此点。

一旦这些主体被忽略了,政治就会显得是一种在宪法和国家机构及社会制度内的利益与权势之争。最近几年的一些较大的争论中,如伊拉克战争,较早的科索沃以及别的医学方面的讨论中,人发挥了重大作用。尤其在民主方面,除政治家外,首先是公民,他们投否决票或赞同票,其次是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发言。迄今为止,尚未有一种民主单凭民众的相应意愿而产生,即

便是很少的公民发动了民主化运动,如同民主德国崩溃那样自下而上,它也必须指望迅速得到众多人的支持。若民主化是自上而下的,或者甚至像在阿富汗或伊拉克那样是由外部推动的,它也需要居民相宜的意愿。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只有除国家机构外再建立起一种多角色的公民社会,民主化方能成功。下面的一些考虑并非想表示一种简单的对立:公民代替机构与制度,而是寻求一些补充,与此同时借助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寻求调解,因为公民社会构成了一些独特的、非列入预算的机构。

基于这一基本思想,自由民主的一些客体性机构及一些社会制度需要一种主体性相似物,需要公民的责任性及他们的德性。从德性的原本意义上讲指的就是一种极高的工作能力及取得成就的意愿。这里的需要可从两个层面上加以理解:微量对自由民主的形成及其在当今险情中的存续而言是极为必要的,但若要让自由及民主兴旺发展,微量是远远不够的。

在公民德行和公民社会繁荣之处,集体不再是公民为其自身利益所使用的公共资源的完美化身,公共权力亦不再以当局之形式出现。迄今为止,国籍法意义上的公民、政治社会意义上仍为臣民的人从强调的意义讲已转变为积极参与集体形成的国家公民。这一变迁显然影响了集体的结构。一些政治机构失去了独占权,当权者失去了垄断权,因为从今以后他们要与公民分享政治领域,但这不会削弱民主,兴许会使国家与社会间的(无必要的)分离受到限制。

由于公民也在非国家的机构中表达心声,可把这一结果称之为国民社会,然而这里指的是公民社会,而不是法律和国家意义上的公民社会。若民主的典型特点中添加了直接民主的一些要素,随之出现的民主特色会进一步得到加强,这样集体就会更清晰地变成一种共同的与此同时又是公开的事务。在这样的共和国中,从强调的意义上讲,在一个不仅是国家的,同时也是自

由人和平等人的政治社会联合体中,公民至少从推断角度讲享有古代公民的双重权限,既有统治又有被统治的能力。他们既对规定的修正(直接或通过代表)也对现行法规的认可负有责任。

这种集体的主体从狭义上讲便是政治公民,即国家公民。然而就是非常有责任心的国家公民也并非仅满足于一个集体的繁荣。一种在各地掀起的对第二种专注于收益的公民角色,即资产阶级之厌恶忘记了一些物质与经济方面的前提:掌权者想要被抚养;热衷于公民运动的国家公民,若他们不自身退化成掌权者,不名誉性地不取报酬地从业,自然就要自己养活自己,他们必须创造出经济上的剩余价值,后者作为税收为公共事务提供资金。由此而需要的经济公民第二次限制了这些政治机构。现在不是有利于个人,而是整个势力范围有利于一个前政治的,尽管是并非必要的非政治领域。这种全球性的行动需求最终要求第三种作用,它不再是作为一种抉择,而是作为世界公民互为补足的一种补充,并非排他的世界公民。

这种就公民与公民德性的新讨论关注的是一种主要的角色,即国家公民,它不考虑当权者,对经济公民和世界公民也不予考虑。此外,它几乎不探讨公共机构的补充问题,不探讨公民社会,这些讨论会忽略公民的能力、意愿及德性,仿佛存在于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说教之浓味之中。

事实上,当今公民扮演着所有这三种角色。通常他把许多社会理论为简化起见而分解的东西集合在自身上。以经济公民为例,尽管失业率很高,绝大多数公民还是自己养活自己。他们又作为国家公民对经济政策的框架条件施加影响,而经济和政治在没有必要放弃地区固定性的情况下早已全球性地联网了。与起先全球化的全球性理论不同,所期待的经济政治方面的世界一体化只是部分地实现了。在经济、科学乃至政治与文化领

域,地区性的一些因素,部分的甚至本地的一些因素均发挥着作用。这点恰好支撑了我的论点:虽然已形成了全球的文明框架,但全世界同类的文明并未形成。

众所周知,希腊,尤其是雅典,为政治提供了一个世界历史上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实验场所。政治实践经常为理论作前导:如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Orestie*)情节把早已完成的从血亲复仇向公开的审判权的过渡搬上了舞台;梭伦与克利斯提尼所推行的民主化运动时间上先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若像往常那样只关注哲学,则就公民这一主题而言,一种与目前的双重反差显得尤为明显。

第一种反差:近代的政治哲学越来越局限于机构与社会制度,而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看来,它显然是一种政治的双重理论,一种既是人又是机构的理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有关人的理论,即伦理学,与有关宪法和机构的理论,即政治学,是相互交错的。完美的性格德性、普遍正义之宗旨在于政治共同体的幸福,但它不是个体的幸福所认为的那种幸福。不是一位成功的人,而是专制政治家的模式被视为理智美德之典范,正是这种聪颖对幸福生活负有责任。

经过一番抗辩,统治者与公民的德性必要性取决于古典时期之特点,因而它在近代被超越了。只要回顾一下雅典历史便会削弱这种抗辩。梭伦想通过其改革促进政治意识及公民德性,而随后的一些改革主要涉及的是相同性,即一种严格相同的秩序:应借助于一些机构网阻止个人霸权及政治结盟,权力与正义几乎惟独借助制度予以保障。正如人们很少关注的那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种不仅是制度化,而且也是关乎人的理论来抵制仅仅制度保障之缺陷,这使得他们的政治双重理论既时尚又具有现实性。

第二种反差:雅典作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用场所,

为一种广博的、对三种公民角色都强调的公民理论提供了最佳的前提：梭伦和克利斯提尼的政治改革为国家公民开辟了一个巨大的活动范围。经济使得雅典呈现出一种全面的，自然也有文化方面的繁荣。这个当时处于鼎盛时期的拥有霸权的城市共和政体不仅与其他希腊共和体，而且也与波斯和卡塔戈维系着受合同约束的国际关系。尽管如此，也还出现了双重的狭窄。在亚里士多德著名的合法宪法理论中，公民是一位较之于当今远为广博和富有精力的国家公民，然而他们为此获得的奖赏，几乎称不上是经济公民，更不用说是世界公民。

一方面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类学把经济视为是不可放弃的，但它又是被毁灭在生活世界之中的，在一种美好的、幸福与成功的生活中不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在国际层面上，雅典是一个强大的中间力量，文化方面甚至几乎称得上是世界力量。尽管如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未把民族的，甚至是民族主义的国家公民存在，即政治的角色，局限于世界公民存在的方向，即宇宙政治的角色。其政治哲学并未有意义地探讨泛希腊主义的（panhellenische）集合体，尽管它对政治个体，如鉴于波斯的威胁，对成功的生活、宗教、语言文化及某些法律方面的联合而言极为必要。一种对随后希腊内部联邦制国家作率先准备的政治上分层次的公民存在并未予以考虑：首先是雅典人和斯巴克人，其次是希腊人，最后是与其它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正因为如此，在政治思维之外开始了对希腊人极端的小邦分立主义展开了批评：赫拉克利特引用世界秩序；智者安提丰引证生物的共同性；德谟克利特用世界上到处被人熟知的普遍理性作证。

人们应谨慎地概括为所有的集合体均有邻居，且它们不可避免地要与邻居接触，有些以合作形式和睦相处，有些处于竞争与敌对之中。因而被希腊人忽略的两个维度具有人种学根源：